

▼ 江腊生◎著

XINSHIQIWENXUEDEJIAOLV
XUSHIYANJIU

新时期文学的焦虑
叙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XINSHIQIWENXUEDEJIAOLV
XUSHIYANJIU

新时期文学的焦虑
叙事研究

江腊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江腊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4906-5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吴义勤

江腊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引人关注的青年学者。其在新时期文学研究领域用力尤勤，所撰写的诸多论文都很见分量。手头这本《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是他申请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视角新颖，论证细密，又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著作。

新时期文学距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三十年既是文学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文学与历史、政治、生活的纠缠深刻而复杂。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也正日益变成一种“显学”，许多专家、学者都贡献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江腊生的这本著作独辟蹊径，从文学焦虑的视角来考察新时期文学的文学表征与精神脉动，力求避免单纯倚靠外在政治话语以及凭借西方话语来演绎中国文学场域的弊病，显示了独到的学术眼光。

焦虑本是心理学的术语，但江腊生借用它来作为阐释中国新时期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独特路径，却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正如本书的“引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固然有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学审美的参照体系，但贯穿其中的却是一条与日俱显的焦虑主线，弥散在文学文本中构成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情绪内涵。也就是说，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生活在焦虑的状态之中，整个社会呈现出焦虑无所不在的文化情绪，构成了文学的主体。因此个体内心世界的焦虑、社会层面的焦虑情绪，文本内部的审美焦虑，共同转换成现代文学中的一系列价值冲突，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内在的紧张和局促状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文学的焦虑集中表现在文本内部中种种大小不一的冲突。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奇特段落，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政治斗争、体制变革与转

接踵而至，透过这些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不断受到威胁，并陷入合法性存在的危机与冲突。无论‘五四’文学、普罗文学，还是新世纪的消费写作，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启蒙革命到市场改革两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挣扎感、获解放感、阵痛感和困惑感，也不同程度地渗透着启蒙、人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西方文学主题。这些冲突或来自社会文化层面不同话语世界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个体内心世界中原始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或来自在中西方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它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撞击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有的表现为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更多的为一种左奔右突、模棱两可的关系，‘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正是这些复杂多元的冲突关系，引发不同时代情境中的作家主体焦虑不安，并透过他们的内心观照，编织出各种不同价值冲突之下富有张力的文学审美空间。也正是这些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焦虑，驱使中国文学一步步走进政治化、市场化与审美化之间的尴尬境地。”因此，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来说，现代文学的焦虑叙事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将焦虑作为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考察点，结合百年来中华民族走过的精神历程和文化踪迹，探讨文学主体内部中各种话语谱系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触摸到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心灵流动”，无疑会打开文学史的空间，提升文学史叙述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将文学焦虑作为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还有着另外的意义：“一是尽力消除文学政治化或文学市场化的简单倾向；一是从个体的创作心理出发，把握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与个性特征。”

在我看来，江腊生关于文学焦虑的思路在《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贯彻。全书除“引言”外，以七章的篇幅系统梳理了新时期文学对于焦虑的表现历程和表现形态。第一章从政治与人性焦虑的视角重新阐释伤痕与反思文学思潮，第二章从现代焦虑与理想困惑的角度反思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的焦虑特质，第三章从民族记忆与文化焦虑角度讨论乡土文化小说与寻根小说，第四章对先锋小说隐藏在现代技巧和实验快感背后的诗学焦虑进行挖掘，第五章探讨女性小说和新生代小说弥漫的世俗焦虑，第六章阐释新历史小说和80后青春写作所呈现的话语焦虑，第七章反思新写实小说和新世纪底层写作背后的精神焦虑。在江腊生

的努力下，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潜隐的思想线索、情绪线索和精神线索得到了清晰的呈现，新时期文学的面貌甚至文学史本身都被有效改写，有关新时期文学的那些惯性认知、常识性的判断、机械的归纳都某种程度被修正，新时期文学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多元性也由此得到了还原。而这也许正是江腊生此本著作最大的贡献。

当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有其局限性。《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对新时期文学的重新阐释固然给人以启示与冲击，但是过度阐释的现象也还某种程度存在着。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试图以一种理论来对一个时期的所有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甚至武断之感。对于江腊生来说，这种理论的阵痛也许只是一种成长的烦恼，我相信，高度的理论自觉、对学术的执着、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勤奋刻苦的精神，都会帮助他在未来的学术之路上变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自信。

是为序。

2013年国庆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序	(1)
引论	(1)
第一节 焦虑的概念内涵及本土化理解	(1)
第二节 文学焦虑的产生	(4)
第三节 文学焦虑的文化构成	(9)
第四节 文学焦虑与文学忧患	(26)
第五节 近三十年文学的焦虑形态	(34)
第六节 文学焦虑的价值与缺陷	(41)
 第一章 政治与人性的焦虑	(46)
第一节 伤痕遗忘与情绪记忆	(46)
第二节 文学反思与话语认同	(57)
 第二章 现代焦虑与理想困惑	(72)
第一节 改革叙事与文学焦虑	(72)
第二节 知青理想的质疑与复杂的骄傲	(87)
 第三章 民族记忆与文化焦虑	(101)
第一节 民间文化与现代审美	(101)
第二节 文化寻根与走向世界	(105)
 第四章 现代技巧与先锋焦虑	(120)
第一节 朦胧诗的传统与现代	(120)

第二节 先锋实验的快感与焦虑	(137)
第五章 堕入世俗的个性焦虑	(153)
第一节 女性世界的话语焦虑	(153)
第二节 文学个性化与消费化	(170)
第六章 青春激情与历史想象	(190)
第一节 历史架构与人性突破	(190)
第二节 青春的忧伤与自恋的激情	(210)
第七章 精神焦虑与人文关怀	(221)
第一节 生存的无奈与价值的迷失	(221)
第二节 和谐意识与城乡焦虑	(243)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58)

引 论

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了，这三十多年间没有战争的硝烟弥漫，也没有政治运动的席卷，文学总体上在朝着一个自由多元的空间发展。但这三十多年来经历的一次次思想解放与文化思潮，却丝毫不逊色于从前，中华民族无论在物质现代化，还是精神现代化方面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对于新时期而言，巨大的物质、精神层面的落差，将民众带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焦虑状态。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间状态，也是中华民族从忧患时期步入正常时期的世俗生活状态。因此，结合三十年多来中华民族的生存事实，以文学焦虑的视角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表征、精神脉动，能够避免单纯倚靠外在政治话语统摄文学的进程，也能够避免凭借西方话语来演绎中国文学场的构成。因为焦虑在文学世界中既连通了个体的内心体验，又连通了诸多层面的社会事实，在文学的生产机制与美学机制方面正好达成一致。于是，文学焦虑的概念被引出，它不在于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而是契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阐释路径的一种努力。

第一节 焦虑的概念内涵及本土化理解

“焦虑”是原本属于心理学的术语。在精神分析学说中，焦虑被视为一种精神障碍，它由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引起，或者说作为生命能量的力比多受到压抑而产生，可以使患者感到不安、恐惧和痛苦。弗洛伊德认为，人总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当中。因为潜意识、本我、本能追求满足的强大心理能量，常常既同超我的控制相冲突，又同外界现实相矛盾，从而产生内在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得到部分释放或完全释放，张力才能减

少，矛盾才能解决，身心才能恢复平衡。但是，结果往往不能如此，因而压抑与抵抗之间的矛盾就会形成焦虑。^①虽然弗洛伊德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生物还原倾向，却从一个角度涉及了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因。即焦虑是主体对现实情境所体验到的一种含有忧虑、不安、恐惧、紧张和苦恼的情绪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带有不愉快情绪色彩的心态。

在弗洛姆看来，“人摆脱了束缚他的所有精神权威，获得了自由。但恰恰是这个自由使他孤独焦虑，使他为个人的微不足道及无能为力感所淹没。这个自由而孤立的个人被他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体验所击溃。”^②同样，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的状态。”霍妮把焦虑解释为“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③她指出，这种基本的焦虑，不属于先天的生物本能，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文化冲突造成的。不管焦虑如何定位，焦虑的根源来自何处，都体现了西方哲人对20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处境的探求。如果说弗洛伊德的焦虑，更多的是重视个体的内在因素，是一种生命本能层面的焦虑，那么霍妮的焦虑理论则重视个体的外在因素，是一种社会文化冲突下引起的个体内在世界的焦虑。

对于广大中国作家而言，焦虑一词更多地来自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的焦虑”理论。布鲁姆以一种独特的心理学视角阐发了关于文艺传统与创新的观念。他认为前辈作家对于后人可能具有消极影响，即前人巨大的诗歌成就可能使后人产生巨大的心理焦虑，而成为其创新途中的障碍，后人不得不通过误读的方式偏移前人影响的辐射。布鲁姆指出，“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④。显然，这里的“焦虑”是一种艺术创新的途径，也是诗歌创新的理论。在现代中国，则明显体现了横向的西方文学和理论对中国文学场的影响的焦虑。最具典型性的是洪子诚认为，中国文学界存在着普遍的“焦虑症”。在对文学现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4页。

② [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8页。

③ [美]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页。

④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现伟大作家，出现文学的辉煌时期。^①显然，评论界近年来频频出现文学焦虑症的说法，是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学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学话语一种近乎本能式的反应，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外部的求新焦虑。其中有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认同焦虑，有本土的文学代际的认同焦虑。创新与影响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在批评领域的焦虑特征。

然而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固然有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学审美的参照体系，但贯穿其中的却是一条与日俱显的焦虑主线，弥散在文学文本中构成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情绪内涵。也就是说，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生活在焦虑的状态之中，整个社会呈现出焦虑无所不在的文化情绪，构成了文学的主体。因此个体内心世界的焦虑、社会层面的焦虑情绪，文本内部的审美焦虑，共同转换成现代文学中的一系列价值冲突，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内在的紧张和局促状态。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文学的焦虑集中表现在文本内部种种大小不一的冲突。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特段落，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政治斗争、体制变革与转换接踵而至，透过这些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不断受到威胁，并陷入合法性存在的危机与冲突。无论是“五四”文学、普罗文学，还是21世纪的消费写作，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从启蒙革命到市场改革两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挣扎感、获解放感、阵痛感和困惑感，也不同程度地渗透着启蒙、人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西方文学主题。这些冲突或来自社会文化层面不同话语世界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个体内心世界中原始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或来自在中西方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它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撞击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有的表现为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更多的则为一种左奔右突、模棱两可的关系，“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②”。正是这些复杂多元的冲突关系，引发了不同时代情境中的作家主体焦虑不安，并透过他们的内心观照，编织出各种不同价值冲突之下富有张力的文学审美空间。也正是这些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焦虑，驱使中国文学一步步走进政治化、市场化

① 洪子诚：《八分钟的发言：文学的焦虑症》，见杨国良主编《古典与现代》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与审美化之间的尴尬境地。

内在地将现代文学定位为一种焦虑叙事，绝非想当然地建构文学史的叙述方式，而是将焦虑作为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考察点，结合百年来中华民族走过的精神历程和文化踪迹，探讨文学主体内部中各种话语谱系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触摸到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心灵流动。将文学焦虑作为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意味着文学阐释的两种努力：一是尽力消除文学政治化或文学市场化的简单倾向；二是从个体的创作心理出发，把握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与个性特征。这里的焦虑，不是心理学层面的单纯人性探讨，也不是单个的某一个作家个体或人物个体的人性品格研究，而是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入手，探讨各个时代的焦虑形态在文学流派或思潮中的表现。其中既有对个体创作的心理层面的探究，又有对外部思潮和文化语境的把握，进而分析其中本质性的精神内涵和美学形式。

第二节 文学焦虑的产生

一般来说，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往往引发人们面对世界的焦虑与矛盾。自屈原以来，到杜甫、白居易等无一例外。屈原青年得志，官至左徒，深受楚怀王信任。因此，他积极参与现实，拯救楚国，实现美政。《九章·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显然，屈原在此流露出对自己担任左徒一职及拥有的相关功业的骄傲、留恋和自矜。但是，在楚国宗室贵族的把持下，楚怀王不仅贪图享乐、听信谗言、宠幸妖姬，导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群芳之芜秽”，甚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于是，在贵族群体包围中，屈原显得孤危，但他必须在孤危中坚守“两美其必合”的人生信念以实现美政理想；同时，在大多出身卑微而“以道自任”的“士”阶层面前，跻身“中心”更加刻不容缓。在屈原的自我意识深处，顽强地潜藏着一个楚国贵族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身份焦虑和文化焦虑。司马迁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

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等作品中，曾经的政治辉煌和悲惨的放逐命运紧张对峙，感性的楚地巫官文化和理性的华夏史官文化的融合，将屈原卷入自悲自叹、怨天尤人、孤芳自赏的焦虑旋涡中。焦虑带来的压抑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在神经质般的满腹牢骚中得以宣泄，在自恋般的对人格理想的坚守中寻求缓释和升华的途径，从而开创了沉郁顿挫、飘逸缠绵、刚柔相济的诗学风格。

在杜甫的一生中，他经历了唐开元年间经济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生活的安定，也经历了李杨专权、科场失利的不幸与贫困。儒家的仁爱与社会的批判成为杜甫焦虑心态的复杂表现。他对儒术的深深眷念之中不无嘲弄，在对儒家身份的自豪之中又包含着儒者的慨叹与愤激。“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这些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儒者身份和指向的认同与自豪。然而，他又愤激地认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一方面，他流连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远大理想，即使在经历了十年长安的穷困潦倒后依旧认为“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体现了其政治理想实现的愿望。另一方面，儒家的仁爱之心与“兴观群怨”的诗歌精神，又促使他直面社会的黑暗，将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高层。他希望人们的生活“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当看到战争带来的黑暗与残酷时，他毫不迟疑地批判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特别是看到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时，他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提出了沉痛的控诉。正是这一系列复杂的焦虑与冲突，构成了杜甫诗作对国家兴亡盛衰和个体存在的反思，其中有对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深深失望，又有对未来生活的呐喊呼吁之余的朦胧希望；既有个人气质的狂傲与浪漫，又有奉儒守官的谨慎与忧患。杜诗中大量出现的“安得……”的句式，正是作家独特的文本焦虑和复杂情绪的相互融合，这些句式构成了杜甫诗中既有诗史的力量与宏大，又有诗美的创新与老成的特点。

进入现代以来，西方个性主义的话语体系，为中国文学探入内心世界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思维的根本。文学焦虑的探讨，为人性的内在阐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自此，人们开始了“心”的旅程，在启蒙与救亡、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欲望与理性之间陷入了现代

性的焦虑。如果说屈原与杜甫等人的焦虑属于家国与个体之间的焦虑，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焦虑与游移，那么现代文学的焦虑则是一种主体开始觉醒的焦虑，一种在强大西方话语背景下的充满危机和渴望的焦虑状态。西方各种现代心理科学和医学的发展，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学说等理论为中国文学探入人性的深处，从个体的性格和原始本能等方面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资源。从此，中国文学走出了过去重外在行动，轻内在心理的文学传统，开始向心理、性格等层面的文学张力叙述。人的观念由过去的功能性、脸谱化向本真性、复杂化的轨道发展。

自然，作家性格气质的构成，是文学焦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普遍让人感觉到一种令人无法擦去的苦闷和迷惘。透过这些充盈着焦虑情调的最内在、最彻底的性格心理挣扎与宣泄，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颗属于那个时代最为敏感的心灵。

郁达夫的小说中众多主人公的性格、心理和感情方式都极其相似：软弱、多情，不甘沉沦，拼命挣扎，洁身自好又苦于情欲，欲望如诗又屡屡幻灭，追求理想又耽于伤感。在初版《沉沦》的自序中，他指出：“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苦闷与灵肉的冲突。”^①显然，在时代语境和性格气质共同作用下，处于极大焦虑的作者有意将人物逼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焦虑世界，拷问他（自我）的情欲与理想的冲突。于是我们不必扩大爱国主题来肯定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其中的性格伦理意义与政治倾向之间的焦虑状态才是其中的根本。与其说人物报国无门，在情欲中找到麻醉，不如说通过情欲与社会之间焦虑来理解其中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挣扎。一方面，他那激进的政治观与正直的道德感敦促他形成社会政治层面的危机，另一方面，他纤细敏感的忧郁型气质，又时时提醒他崇尚个性，遵从自己内心的欲望奔涌。他一直徘徊与迷乱在两个世界的冲突之间，透出的不是批判性的力量，而是焦虑的情绪：浓烈、真挚、悲寂、激愤而凝作一团的状态。因此，郁达夫的小说没有“五四”转型时期的兴奋与躁动，却有来自身体深层的性格欲望与政治风云之间的焦虑冲突。

于是，作家一定性格与外在时代碰撞产生的焦虑直接投射到他们的作

① 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品中，产生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焦虑。此时的“现代性的焦虑”具有双重维度：一个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中，力图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一个体现在个体的现代性的领域，即作家渴望建立一种与现代化变革相匹配的现代文学，推动传统文学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于是，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现代性冲突与焦虑以一种磨砺与对抗的状态，成为现代文学的本质存在。

“历史中间物”是鲁迅文学焦虑的体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价值，经验与判断，启蒙与超越启蒙等，共同支配鲁迅带着他的冲突、绝望和希望走进一个充满危机和焦虑的世界。汪晖指出：“他从一种惶惑走向另一种惶惑，从一种矛盾走向另一种矛盾，从一种痛苦走向另一种痛苦，生活与世界的复杂性，把握世界的内在矛盾性，心灵深处的绝望与虚无，远远逝去的不可捉摸的青春，无常女吊的神秘的魅力。这一切都没有销蚀他追求真理的勇气，相反，有些却成为鼓舞他‘反抗绝望’的动力。”^①

在鲁迅的创作中，始终徘徊着一个难以形容、无可捉摸的幽灵。《呐喊》自序中他坦承自己的曲笔是“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而在《呐喊》中却是出于“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这一悖论的文学世界超越了希望与绝望、未来与过去、虚无与实有、乐观与悲观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得小说的精神在众多对立主题的焦虑状态下沿着自我怀疑、自我嘲弄、自我省察的道路不断延伸出生命和艺术的张力。《野草》塑造了一系列内心世界的“自我”焦虑者形象，揭示了作家内在心境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让自我走出绝望的焦虑境地。《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和《死后》等文章都以“我梦见自己”作为文章叙述的起点，以梦中的“我”承载焦虑的痛苦，来实现对命运的征服和对现实处境的超越。焦虑是鲁迅人生哲学的基本前提，它构成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挣扎，也延伸出了“反抗绝望”的悲怆与复杂。“无物之阵”下的焦虑逐渐荡开成一片无法驱除的“寂寞”，成为“反抗绝望”的内在依据。

^①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当历史进入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建设时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革命战争与政权巩固的兴奋期。尽管现实中还存在痛苦和贫穷等诸多问题，但人们普遍怀着简单的历史激情，朦胧而美好的期待，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心理上，并未产生一种普遍性的挫折感。尤其是知识分子，处在革命战争与新中国政权巩固当中被主流政治肯定的兴奋期，即使有焦虑，也由于时代与社会提供了较大的释放空间，而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所以，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焦虑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情绪，作为文学意义上的焦虑也未在主流文学中出现，更多的是一种对革命成功历史的追忆与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的激情。中西方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造成了文学逡巡于曾经的战争历史的追忆，相对封闭的文化状态直接影响了文学简单的激情，却缺少文学内在的绞缠与张力。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对立，直接造成了文学领域的二元对立，文学文本中多以政治焦虑的形式出现，并很快消融在简单化的激情叙述当中。从十七年文学到“文化大革命”文学，人物的行动、场景的设置多为政治话语的图解，即使有一些展露人性价值的苗头，也很快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政治历史叙述的轨道中。众多的革命历史叙事，多为战争文化的演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红日》等小说在凸显革命意志与激情的同时，一般都停留在文学的外部叙述，而没有探入文学内部，尤其是人性深层的冲突与矛盾之处，作复杂多元的历史人性的思考。此时的文学焦虑，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影响的焦虑”，即在政治对抗中产生的焦虑。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

自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从以往的创伤性经验中走出，新时代的兴奋与伤痕的哭诉一方面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追忆，使人们在呼唤人的主体归来的同时，陷于历史与现代之间的焦虑；另一方面，长期封闭的文化状态随着国门的打开，吹入的世界现代之风，使人们又急于甩去以往的创伤性记忆，驶入世界文学现代性的快速车道中。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纷纷成为当代作家的巨大参照。此时的文学处于融入“世界文学”与确立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间的焦虑状态。

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一个理想逐渐缺失，欲望失去底限的社会陷入了全面的焦虑状态。人性欲望的挣扎，物质消费的诱惑，贫富两极的分化，精神物质的错位，人们激情充溢却又危机四伏。这些冲突与危机，将文学带入了一个既属于个性相对自由的世界，又陷文学于消费话语之下

的尴尬空间。

第三节 文学焦虑叙事的文化构成

焦虑首先来自个体对自我存在及其最内在困境所体验的不安和恐惧。伟大的文学作品所透露出来的焦虑，与其说是指向作家身外的社会文化，毋宁说是指向作家内在的个体文化，也就是说，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焦虑，常常是作家在其最直接的存在困境中的一种自我叩问、自我深省乃至自我批判。

首先，文学焦虑建立在新时期人的观念的变化的基础上。一定时代的人的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焦虑状态。人的观念的变化，各种人的观念的冲突与撞击，直接影响了一定时代的焦虑程度。新时期文学是对“五四”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都一次深似一次地持续着这种人的观念的寻找、恢复与再深入、再探索。其中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人的观念是新时期主要的人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曾经发生肆意践踏和蹂躏人权、人性、人道主义的现象的控诉、批判和反思，已成为一次全社会的思想行为，很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发出人道主义的呐喊。刘心武的《班主任》在救救孩子的呼声中，要求人们正视人性的问题。他认为：“关于人性的问题我呼吁大家都来关心。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麻木不仁。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人性大沦丧，大规模的人身侮辱、人格侮辱，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①戴厚英的《人啊人》，表现了“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思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一反过去长期的束缚和压抑，虽然小心翼翼却开始正面描写婚外情的精神之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始大胆直露性爱，书写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自由与完整。其他陆续发表的小说如《我是谁》、《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等；戏剧如《报春花》、《丹心谱》等；报告文学如《大雁情》等；诗歌如《我爱》、《在浪尖上》等，都不同

^① 刘心武：《艺术个性问题浅谈》，《福建文艺》1981年第1期。